

隔代照料对儿童沉迷网络的影响

——基于 CFPS 数据的实证分析

胡南燕, 宁满秀

(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 基于 2014 年和 2016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 考察隔代照料对儿童沉迷网络的影响。研究发现: 隔代照料对儿童沉迷网络具有显著的助推作用, 且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父母外出也会显著促进儿童沉迷网络。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 对于母亲从事非农就业和跨省工作的儿童来说, 隔代照料更为显著地增加其沉迷网络的可能性。

关键词: 隔代照料; 儿童; 沉迷网络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0)04-0063-06

Influence of grandchild care on the internet addiction of childre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FPS data

HU Nanyan, NING Manxiu

(School of Economics, Fujia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in 2014 and 2016,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grandchild care on children's internet addi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grandchild care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impact on children's internet addi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the robustness test. In addition, this study finds that parental migration can also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children's internet addiction. Furthe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for children whose mothers are engaged i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inter-provincial work, grandchild care may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internet addiction.

Keywords: grandchild care; children; internet addiction

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向城市。《2018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我国农民工总量为 2.8 亿人, 其中一半左右是青壮年劳动力^[1,2]。由于户籍管理制度和自身经济条件的制约, 进城农民工子女难以在城市获得同等的教育资源。因此, 这些孩子被留在农村由其他长辈和亲戚代为

照料, 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的留守儿童群体。段成荣等根据 201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计算得出, 全国留守儿童规模为 6 876.6 万, 占全国儿童的 25.39%^[3]。随着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 留守儿童的规模呈递增趋势^[4]。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 一方面为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另一方面, 于农民工家庭而言, 自身家庭经济状况得到有效改善, 客观上为子女的教育与成长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不容忽视的是, 父母长期外出造成部分儿童与父母分离, 导致儿童严重缺乏父母的抚慰和关怀, 进而影响其身心健康。更为重要的是, 劳动力的流动也导致家庭照料方式发生了变化, 从双亲照料转变为隔代照料。已有调查数据显示, 在留守儿童的照料模式中, 隔

收稿日期: 2020 - 06 - 2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71773017)

作者简介: 胡南燕 (1996—), 女, 湖北鄂州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与社会保障。

代照料比重高达 89.3%，可见隔代照料在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5-7]。但隔代照料的祖辈年龄普遍偏高，且受教育程度较低，由于受到这些限制，祖父母在照料和教育儿童时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在监管儿童互联网社交行为上^[8]。

近年来，隔代照料的问题引起学术界极大的关注。有关研究表明，父母长期外出使祖辈往往既要肩负监护人的责任，又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和农活^[9]，以致其对儿童的关注不足^[10]，进而对儿童的心理、教育获得以及身体健康均会产生不利影响^[11-13]，无疑会影响儿童早期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在未来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令人担忧的是，隔代照料只能为孩子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无法提供情感支持^[14]，再加之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导致孩子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15]，而互联网构建的虚拟世界刚好可以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显然，频繁的互联网社交行为导致儿童出现沉迷网络的状况，严重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16,17]，目前儿童沉迷网络的现象在我国已经非常常见，关于其背后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还缺乏进一步研究。本文借助中国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考察隔代照料对儿童沉迷网络的影响，试图探究儿童沉迷网络背后的原因是否与其照料方式有关。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隔代照料主要指儿童因故无法由父母亲自照料，而由祖父母代为照料及负担抚养责任的情况^[18]。大规模的中青年劳动力由农村流入城镇，隔代照料成为儿童的主要照料方式。然而，祖代、父代与孙代因出生年代与成长背景不同，代群之间在价值观、偏好、态度与行为等方面呈现出具有差异性的群体特征^[19]，这些代际差异可能会影响家庭功能有效发挥，进而影响儿童互联网社交行为。

儿童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互联网已经渗透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对于年龄较大的祖辈而言，他们通常很难像孙辈那样“自然而然”地接受和使用互联网。通过对比发现，祖辈和孙辈在互联网参与行为上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会引致祖辈在监管儿童互联网社交行为上存在以下两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其一，大多数祖辈无法掌握互联网的相关知识，亦无法认识到沉迷网络给儿童带来的负面影

响，更难以对其互联网社交行为进行科学引导；其二，部分祖辈缺乏对儿童互联网社交行为的管教意识，即使有的祖辈具备了管教意识，而代际差异产生的代沟会导致管教无法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以上分析说明，代际差异导致祖辈无法对儿童（孙辈）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引导，势必会增加儿童沉迷网络的可能性。相比之下，父母照料显著降低儿童沉迷网络的可能性，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年轻的父母与儿童之间的代际差异相对较小，并且父母对互联网社交行为有着科学和清晰的认识，能够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或相关规则来约束儿童互联网社交行为，进而降低了儿童沉迷网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父母能够给予儿童有效的共情陪伴，与儿童进行高质量的沟通和交流，对其互联网社交行为进行科学的引导，因而也会减少儿童互联网社交行为^[20]。由此可见，考虑到代际差异的存在，照料方式的差异影响着家庭功能的发挥，一旦家庭功能弱化便会放松儿童互联网社交行为的约束，提高其沉迷网络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与父母照料方式相比，隔代照料无法对儿童互联网社交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与引导，增加了儿童沉迷网络的可能性。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相比于其他照料方式，隔代照料使家庭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对儿童沉迷网络具有助推作用。

三、研究设计

1. 模型选择

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研究隔代照料对儿童沉迷网络的影响，其中利用互联网社交行为作为儿童沉迷网络的代理变量，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I_i = \alpha_0 + \alpha_1 T_i + \alpha_2 X_i + \alpha_3 Z_i + \mu_i \quad (1)$$

式(1)中，被解释变量 I_i 表示儿童个体 i 互联网社交行为。 T_i 为关键解释变量，表示儿童个体 i 是否为祖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料，如果儿童由祖辈照料则取值为 1，否则取 0。 X_i 为儿童的个体特征及家庭特征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上学距离、父母受教育年限、父母外出状况和家庭总收入等变量； Z_i 描述了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固定效应，用来控制经济、政策和环境等无法量化的因素； μ_i 代表随机扰动项。 α_0 、 α_1 、 α_2 、 α_3 为待估计参数。

2. 变量选择

因变量为儿童互联网社交行为,利用少儿自答问卷中“使用互联网社交的频率(次)”的问题生成,该问题的回答是:1.几乎每天;2.一周1~4次;3.一个月1~3次;4.几个月一次;5.从不。将前两项定义为互联网社交行为频繁,赋值为1;后三项定义为互联网社交行为较少,赋值为0。

自变量是隔代照料。借鉴卢洪友等的做法^[21],本文根据少儿自答问卷中“孩子晚上由谁照料?”这一问题来构造一个二值虚拟变量,当孩子是由祖父母等老人照料时,则变量赋值为1,否则取0。

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两个方面来选取控制变量,其中,儿童的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及上学距离;家庭特征变量主要包括父母受教育年限、父母外出状况、家庭总收入。不同性别的儿童使用互联网的动机不同而产生了性别偏好,男生使用互联网更偏好于网络游戏,而女生使用互联网主要是聊天社交,偏好的差异引致互联网提供的社交功能对女生产生的作用更大^[22];依据正常上学情况,10岁至12岁儿童可能处于小学阶段,而13岁至15岁儿童可能处于中学阶段,据此,本文以12岁为界限对年龄进行划分。与处于小学阶段的儿童相比,中学阶段的儿童受到约束相对较少,进而互联网社交行为更为频繁;此外,儿童上学距离越远,家庭对儿童互联网社交行为的监督越不力,因而儿童互联网社交行为更为频繁。父母受教育年限越长意味着其受教育水平越高,对儿童互联网社交行为负面影响的认知更加深刻,从而更倾向于采取监督或干预措施来限制儿童的互联网社交行为,进而减少儿童互联网社交行为。父母外出状况可以衡量亲子之间的联系,已有研究表明,父母均外出削弱了家庭的监督功能,从而使儿童互联网社交行为更加频繁^[23]。家庭总收入衡量了家庭的经济状况,家庭经济状况越好,为儿童互联网使用提供了更加充裕的条件,会增加儿童互联网社交行为的频率^[24]。另外,本文还纳入时间虚拟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其中地区虚拟变量根据样本所在省份的经济带区分,将样本所在区域划分为中部、东部和西部。

3.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CFPS),该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其旨在通过对全国代表性村居、家庭、家庭成员的跟踪调查,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为16000户,调查对象为样本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由于本文研究对象为儿童,因此选用了2014年和2016年两期少儿问卷自答部分的数据(仅由10~15岁的少儿作答),在剔除缺失值和异常值后,最终得到1186个样本。

表1介绍了本研究主要变量的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可以发现,儿童互联网社交行为的均值为0.501,说明儿童互联网社交行为较为频繁。隔代照料的均值为0.874,表明有部分儿童的照料方式为隔代照料。父亲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0年,母亲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97年,说明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这与袁梦的研究发现一致^[13]。父母外出的均值为0.759,表明父母外出的家庭模式所占比重较高。家庭总收入平均为21960元,介于比较低和中等之间。整体来看,本研究的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名称	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互联网社交行为	频繁=1, 极少=0	1186	0.501	0.500
隔代照料	晚上由谁照料 祖辈=1, 非祖辈=0	1186	0.874	0.936
年龄/岁	13~15=1, 10~12=0	1186	0.486	0.500
性别	男=1, 女=0	1186	0.552	0.497
上学距离	从住处到学校有多远			
小于1公里	是=1, 否=0	1186	0.417	0.493
1~2公里	是=1, 否=0	1186	0.284	0.451
2~5公里	是=1, 否=0	1186	0.215	0.411
大于5公里	是=1, 否=0	1186	0.084	0.278
父母受教育年限	父亲受教育年限	1186	9.900	3.359
	母亲受教育年限	1186	8.971	3.942
父母外出状况	父母是否均外出 是=1, 否=0	1186	0.759	0.427
家庭总收入/千元	家庭年总收入	1186	21.960	54.558

数据来源:CFPS(2014、2016)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表2为(1)式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由表2可以看出,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方向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隔代照料确实显著增加

了儿童频繁互联网社交行为。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后,隔代照料提高儿童频繁互联网社交行为的概率为 5.8%,表明隔代照料对儿童沉迷网络具有显著的助推作用,由此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可能的解释是,由于祖辈受教育水平不高且思想观念陈旧,互联网的鸿沟导致祖辈对互联网的知识了解甚少^[25],难以认识到互联网社交行为对儿童所产生的影响,更无法有效引导儿童的互联网社交行为。此外,祖辈与孙辈之间的年龄相差很大,两代人之间存在着沟通障碍,进而导致祖辈对儿童互联网社交行为的监督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隔代照料无法对儿童的互联网社交行为进行有效引导和监督,增加了儿童沉迷网络的可能性。

表 2 Probit 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回归系数	标准误
隔代照料	0.058**	0.028
性别	-0.006	0.027
年龄	0.031***	0.228
上学距离		
1~2 公里	-0.050**	0.034
2~5 公里	-0.057	0.367
大于 5 公里	0.105**	0.049
父亲受教育年限	0.006	0.005
母亲受教育年限	0.002	0.004
父母外出状况	0.144***	0.033
家庭总收入	0.001**	0.001
中部地区	0.067*	0.039
东部地区	0.123***	0.037
时间虚拟变量	控制	
观测值	1 186	
Pseudo R ²	0.125	

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接下来,本部分就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进行分析。个体特征方面,与男生相比,女生互联网社交行为更为频繁,可能是因为互联网使用偏好中存在着性别差异,女生使用互联网动机主要为了聊天社交,因此受到互联网社交的影响更大。与 10 岁至 12 岁的儿童相比,13 岁至 15 岁的儿童互联网社交行为更为频繁,可能是因为中学阶段儿童受到的约束相对较少,互联网社交行为会更加频繁。随着上学距离的增加,家庭监督的作用逐渐减弱,促使儿童具有更为频繁的互联网社交行为;家庭特征变量中,父母受教育年限越长,儿童的互联网社交行为越频繁,但回归结果并不显著。父母均外出提高儿

童频繁互联网社交行为的概率为 14.4%,并在 5%的水平上显著。其原因在于父母外出后与子女见面的机会较少,与子女沟通的频率较低,往往不能对子女的互联网社交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从而引致儿童沉迷网络的可能性显著上升。此外,收入越高的家庭,儿童互联网社交行为显著增加,可能的原因是较好的家庭经济条件为儿童提供了更多的互联网社交机会。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前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部分将被解释变量换成儿童互联网使用时长,这是由于较长的互联网使用时长也有可能引致儿童沉迷网络。考虑到互联网使用时长是连续变量,因此本文利用 Stata14.0 软件进行 OLS 回归分析,估计结果见表 3。从表中可以看出,隔代照料对儿童互联网使用长时的估计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表 3 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即相比其他照料方式,隔代照料对儿童沉迷网络具有助推作用。表 3 的控制变量与上述结果基本相一致。但与表 2 结果相比,表 3 中的结果有一点需要注意,即母亲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为负,有可能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母亲对儿童监管更加有力,进而总体上减少儿童互联网使用时长。

表 3 稳健性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回归系数	标准误
隔代照料	1.107**	0.550
性别	0.15	0.543
年龄	3.266***	0.519
上学距离		
1~2 公里	0.177	0.658
2~5 公里	-0.347	0.609
大于 5 公里	2.824**	1.165
父亲受教育年限	0.06	0.084
母亲受教育年限	-0.065	0.082
父母外出状况	1.014	1.660
家庭总收入	0.005	0.004
中部地区	1.711**	0.650
东部地区	2.122***	0.662
时间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186	
Pseudo R ²	0.068	

(三) 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母亲在家庭中扮演着双重身份,不仅是收入的争取者,更是子女的主要照料者,其就业地

点和劳动模式的不同对子女照料质量的影响存在着差异。本部分按母亲的就业状况进行分组回归，进一步考察隔代照料对儿童沉迷网络影响的异质性，估计结果见表 4 和表 5。

表 4 基于母亲工作地点分组的异质性响应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工作地点 在本村/镇	工作地点在 其他乡镇	工作地点在 其他省市
隔代照料	0.163*** (-0.035)	0.139** (-0.049)	0.188** (-0.086)
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96	374	116
Pseudo R ²	0.062	0.032	0.174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表 5 基于母亲工作性质分组的异质性响应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农业劳动	非农劳动
隔代照料	0.122** (-0.053)	0.165*** (-0.317)
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22	864
Pseudo R ²	0.042	0.062

首先，按母亲的工作地点进行分组，将样本划分为本村/镇、其他乡镇和其他省/市三类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从中可以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母亲工作地点在本村/镇、其他乡镇、其他省/市的边际效应分别为 16.3%、13.9% 和 18.8%，且均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母亲工作地点越远，隔代照料对儿童沉迷网络的助推作用愈加明显。究其原因，可能的解释是：当母亲在省外工作时，由于回家的机会成本很高，母亲很少有机会往返于老家与工作地点之间^[26]，与子女沟通交流机会较少，家庭情感功能和教育功能的弱化，致使儿童更有可能沉迷网络。

其次，隔代照料对儿童沉迷网络的影响也可能随母亲工作类型的变化而异。因此，本文将母亲的工作性质分为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两个子样本，以农业劳动为主的样本归为农业劳动的样本，以非农劳动为主的样本归为非农劳动的样本。重复上述的步骤，估计隔代照料对儿童沉迷网络的影响，结果如表 5 所示。可以发现，母亲从事农业劳动，隔代照料提高儿童频繁互联网社交行为的概率为

12.2%，并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而母亲从事非农劳动，隔代照料使儿童频繁互联网社交行为的可能性提高了 16.5%，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综合来看，隔代照料对儿童沉迷网络的助推作用在母亲从事非农劳动上更为明显。可能的解释是，母亲从事农业劳动相对于非农劳动而言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能够同时兼顾工作和家庭，减少了隔代照料对儿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母亲从事农业劳动也促使隔代照料提高儿童沉迷网络的可能性，亦说明虽然母亲的时间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对孩子的照料仍然是不充分的，这与刘靖的研究发现一致^[27]。总体而言，异质性分析的估计结果与上述回归结果基本相同，但鉴于母亲就业状况的差异，隔代照料对儿童沉迷网络的影响呈现一定的异质性。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2014 年和 2016 年 CFPS 数据，定量研究了隔代照料对儿童沉迷网络的影响，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隔代照料对儿童沉迷网络具有显著助推作用。这也反映出隔代照料不能使家庭的监督功能得到有效发挥，长此以往很有可能会引发儿童网络成瘾问题，不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

第二，父母双方均外出显著提高儿童沉迷网络的可能性，且随母亲就业状况的变化而具有显著性差异。对于母亲工作地点在其他省市的儿童而言，隔代照料增加了其沉迷网络的可能性。同时，与从事农业劳动的母亲相比，在母亲从事非农劳动情况下，隔代照料会显著增加儿童沉迷网络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主要有：第一，政府应结合家庭以及社区等各方面的力量来充实儿童的社会生活，使儿童摆脱网络的依赖，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首先，应当建立起以儿童为中心的家庭生活场所，释放家庭的情感价值、生活抚育以及教育监督功能，重新确立儿童的生活意义，从而限制互联网对儿童产生的不利影响。其次，社区应当完善文化基础设施，开展儿童感兴趣的活动来增加社区人际互动，丰富儿童的生活。第二，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保障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能在务工地就近入学，并建立相应的财政资金资助儿童，让这些儿童能够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此外，政府还

可以为女性创造更多就近就业的机会,促使母亲有更充裕的时间照料儿童,进而保证儿童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 [1] 杨菊华,段成荣.农村地区流动农村儿童、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教育机会比较研究[J].人口研究,2008(1):11-21.
- [2] 叶敬忠,王伊欢,张克云,等.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生活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06(1):57-65.
- [3] 段成荣,赖妙华,秦敏.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变动趋势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7(6):52-60.
- [4] 魏东霞,谏新民.落户门槛、技能偏向与儿童留守——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8,17(2):549-578.
- [5] 何圆,王伊攀.隔代抚育与子女养老会提前父母的退休年龄吗?——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J].人口研究,2015,39(2):78-90.
- [6] 周晶,韩央迪,MAO Weiyu,等.照料孙子女的经历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16(7):81-96.
- [7] 李鹏.社区活动参与、保障水平与隔代照料——基于2014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20,42(4):71-78.
- [8] 刘贝贝,青平,肖述莹,等.食物消费视角下祖辈隔代溺爱对农村留守儿童身体健康的影响——以湖北省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19(1):32-46.
- [9] 段成荣,吕利丹,郭静,等.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学刊,2013,35(3):37-49.
- [10] 李云森.自选择、父母外出与留守儿童学习表现——基于不发达地区调查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3,12(3):1027-1050.
- [11] 段飞艳,李静.近十年国内外隔代教养研究综述[J].上海教育科研,2012(4):13-16.
- [12] 姚植夫,刘奥龙.隔代抚养对儿童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J].人口学刊,2019,41(6):56-63.
- [13] 袁梦,郑筱婷.父母外出对农村儿童教育获得的影响[J].中国农村观察,2016(3):53-63,96.
- [14] 魏东霞,谏新民.共情陪伴与留守儿童精神健康——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2018(5):74-93.
- [15] 林宏.福建省“留守儿童”教育现状的调查[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132-135.
- [16] 宁可,朱哲毅,徐志刚.互联网、生活时间配置与农村青少年身体健康[J].南开经济研究,2019(4):81-104.
- [17] Song I, Larose R, Eastin M S, et al. Internet Gratification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O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New Media[J].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2004, 7(4):384-394.
- [18] 宋璐,冯雪.隔代抚养:以祖父母为视角的分析框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7(1):83-89.
- [19] 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M].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20] 郑素侠.城乡青少年媒介使用的家庭环境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13年度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的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37(9):144-149.
- [21] 卢洪友,余锦亮,杜亦譞.老年父母照料家庭与成年子女劳动供给——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分析[J].财经研究,2017,43(12):4-16.
- [22] YEE N. Motivations for play in online games[J].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2006, 9(6):772-775.
- [23] 熊新燕.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子女教育的影响[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8.
- [24] 周广肃,樊纲,申广军.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4(7):12-21,51.
- [25] 程云飞,李姝,熊晓晓,等.“数字鸿沟”与老年人自评健康——以北京市为例[J].老龄科学研究,2018,6(3):14-25.
- [26] 叶敬忠,詹姆斯·莫瑞.关注留守儿童: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27] 刘靖.非农就业、母亲照料与儿童健康——来自中国乡村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8,43(9):136-149.

责任编辑:黄燕妮